

# 地下陣線

中共在香港的歷史

陸恭蕙



英帝國主義是一個反面教員，他們用法西斯暴行，迫使港九同胞展開一場仇視、鄙視和蔑視英帝國主義的運動，從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援助一切可能的行動，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發動強大的反擊……揭發和  
宣傳英帝國主義一百多年來在香港犯下的……  
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義展開  
鬥爭吧！……這一場鬥爭，主要地應作……力軍。  
還應當充分地發動廣大的青年學生，使……



01463593

F6月3日

雖然作者謙稱自己是一個局外人，但在讀過這本書後會發現，即使是知情人士也未必能有如此深刻的分析。陸恭蕙對中國共產黨統戰和宣傳的闡述，對那些不諳共產黨術語的人來說特別有啟發性。鑒於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未來發展舉足輕重，本書絕對是關心香港的人必讀之物。

—程翔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活動已是公開的秘密，但為何它的行徑有如一個非法組織？這段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秘密活動的歷史，是對香港感興趣的人，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認識的。

—秦家驊

陸恭蕙這本新書實在令人信服，可見是認真仔細研究的成果，是所有希望理解中國共產黨如何處理香港問題的人必讀之作。這本書尤其出色的地方，是作者以持平的態度去評價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歷史。陸恭蕙以引人入勝的筆觸，描述中國共產黨領導在冷戰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怎樣以務實的思維去容忍香港這個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前哨站的存在。她對中國共產黨和當代香港兩者關係的分析，有助我們認識北京如何不斷擴大參與香港的事務。一直以來，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角色和所發揮的影響都充滿著神秘的色彩，陸恭蕙成功地作出突破，對這政治組織進行了一次極好的研究。

—顧汝德

要撰寫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歷史是一項十分艱鉅的工作，陸恭蕙卻著手進行了這近乎無法完成的任務。正如她在導言所指，在世界上，執政黨仍是一個地下組織是絕無僅有的事。在黨不現身、黨員又不表明身份的情況下，人們何以能夠找出有關這個地下組織的史料？然而，陸恭蕙成功找到相關資料，並花了很多功夫將它們拼湊起來，把中國共產黨從早期至現在於香港的活動娓娓道來，令這本書變成為一本很出色的讀物。任何對香港的過去和未來感興趣的人，這本書是必讀之選。

—李志喜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 / 政治

ISBN 978-988-802



9 789888 028

# 地下陣線

## 中共在香港的歷史

陸恭蕙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www.hkupress.org](http://www.hkupress.org)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1

ISBN 978-988-8028-69-6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10 9 8 7 6 5 4 3 2 1

盈豐國際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 序

本書是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撰寫。其實，如果不是中共黨員，根本無法知道中國共產黨如何運作。我撰寫本書的目的很簡單，只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有其魅力，令我著迷。

當我還年幼時，從家中那位廣東保姆口中得知，中國是何等貧窮以及共產黨如何「跟其他人一樣壞」。這是當時老百姓對當政者的典型看法。我的父親於1951年從上海來港，他說那些愛國人士（國民黨）腐敗無能，共產黨本應相對較好，但他們卻把事情搞亂。保姆的外甥為來港尋找較好的生活，不惜冒生命危險偷渡（海中有大批鯊魚出沒）。他曾跟我說，共產黨最初還是好的，但後來卻變壞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越少提及共產黨越好，因為那時候中國瘋了。1967年的暴動和土製炸彈，我至今還記得。母親和繼父曾提及是否要離開香港，但暴動很快平息。此後的一段長時間，在我身邊的人鮮有提起共產黨。

1960年代末，那時我十多歲，暑假時總愛在下午到灣仔一間戲院（已拆）看大陸電影。到那裏看電影的人不多，但放的電影其實不錯，因為大陸的電影都跟「革命」和毛主席有關，中國彷彿有其吸引我之處。當然，那時候的中國跟我所認識的香港中國人社會並不一樣。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全球都對中國共產黨產生興趣。從那時開始，我也對這個黨感到好奇，我希望多了解它。大學時期，我讀了很多有關共產主義的文獻。那時（至今也是），我欣賞馬克思的作品，並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是一篇很重要的政治文獻。那時我並不喜歡列寧，但毛澤東思想卻有使人著迷的地方。可是，那時我身處英

國，跟英國殖民地香港有更多聯繫，毛澤東思想也就好像變得不太真實。

直至1980年，我在北京逗留了半年，中國共產黨也就變得真實起來。那時我接觸的人都很友善，但官場不僅官僚，而且一些正規的場合，如在商業談判開始前，更是極其單調乏味：一名資深前蘇聯共產黨員可能會跟你詳述黨的文獻。此後，我曾到訪中國多個地方，跟很多人見面，當中有些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跟很多大陸朋友討論現代中國歷史、中國共產黨對事物的看法，以及中國的未來。在1992至1997年及1998至2000年當上立法局和立法會議員期間，我得以觀察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兒時對共產黨的那份著迷又再回來了。其後我從事政策研究工作，這份工作加深了我對國家政治、中國政治及黨架構的認識。我相信理解列寧主義有助了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

正如較早前所說，本書是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出發，講述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故事。我並不會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歷史，這只是一個濃縮版本的故事。我用上了一些已出版的資料及跟一些人的討論，撰寫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開始跟香港有關的活動。我相信過去從未有人這樣做。對於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早期歷史，陳劉潔貞的*From Nothing to Nothing*最有參考價值。關於東江縱隊的資料，我感謝陳端璋撰寫的《東江縱隊》手稿（經已出版）。同時，我引用了《許家屯回憶錄》以及曾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的黃文放的文章，我也曾於多年前跟他多次詳談。

有些曾協助我撰寫本書的人並不願意我公開鳴謝他們，因為中國共產黨至今在香港仍然被視為一個「敏感」的話題。我要感謝香港大學出版社前社長Colin Day，他對這個課題表示興趣，而且容忍我多次耽擱交稿的時間。另外，他也協助編輯本書的英文版原稿，並提供很有用的意見。此外，我也要感謝香港大學出版社現任社長Michael Duckworth願意出版本書（中文版），並且一直協助我們迅速地完成有關出版工作。我也十分感激葉澱澱，她協助編撰附錄，統籌有關出版本書的事宜，並與陳玉華合

力復查註釋。在她、翻譯權宇，以及高文謙的協助下，本書才得以順利付印。要處理港式中文和大陸中文所引起的問題實在是一個挑戰，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及意見，我實在無法完成本書。

我也要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致謝，他們提供了一些資助，讓我得以在研究初期聘用了一位研究助理，協助翻閱一些資料；也要感謝我的家人，為我提供了餘下所需要的資源，使我可以完成這個研究計畫。我的研究助理文瑞麟是一位極有耐性的人，而且對我的不足十分包容。換了是另一個人，可能早已放棄。另外，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戴高禮博士願意在其民調中加入數個有關港人如何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我也要感謝政府檔案處、新聞處以及《南華早報》提供資料及相片。

我相信本書會引起一些討論，認為本研究計畫在小題大造或是受外國勢力資助。要是真的有這些批評，我希望那些批評的人能持一個開放的態度來閱讀本書。我只是希望說一個故事，並無意貶低中國共產黨。學者定必會找出很多缺漏，但我希望本書能夠引起普羅大眾的興趣。當有一天黨的檔案得以公開，學者將有更多資料撰文。我會為本書的任何事實錯誤、錯誤的看法及誤解負責。

陸恭蕙

2010年6月

# 目錄

序	vii
導言	1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19
第二章 中共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33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歷史 (1920–1926)	49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63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91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13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41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63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193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27



後記	271
附錄一	277
附錄二	283
附錄三	285
附錄四	288
附錄五	293
註	299
政治機構及人物小註	357

## 導言

# 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走到台前」的時候了嗎？

撰述中國共產黨（中共）在香港的存在，顯然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中共潛伏香港，儘管是長久以來眾所周知的事實，卻至今總是「秘而不宣」。現在提出這一話題，可能仍然「政治不正確」，中共與香港的政團每因積習，都迴避這個問題。然而，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人們想更了解其在香港的歷史、政策及活動，實無可厚非。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成立第14個年頭之際，應該是回顧中共如何在香港運作的時候了。在世界上，像中共之為執政黨，而在香港卻仍然是個地下組織，可說絕無僅有。隨著中國在全球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其執政黨不願公開自己在本國最發達城市的存在，更未免有違常理。不過，這一切或許會改變。

中共是全國的執政黨而其在香港的存在保持隱密，是個矛盾現象。實際上，中共和香港的關係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其淵源可追溯到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以前。19世紀，清政府被迫簽署「不平等條約」，把香港割讓租借給英國，由英國暫時管治，而中國「在時機成熟時」可收回失地。二戰之後，國民黨有意收回香港，但未如願。1949年以後，中共之所以願意等待長時間才解決香港問題，是因為宣稱擁有香港主權而容讓英國在港享有治權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對中國有利。<sup>1</sup>中共在香港的故事，講的正是其如何處理這矛盾。從中共建黨之初，香港就是有利黨員及其盟友進行革命及政治活動而且相當安全的避風港，這些活動包括聯絡、宣傳、統戰活動、籌款和收集情報等。對內地來說，香港也

是一個與海外同胞進行貿易、貸款、投資及接受捐獻的好地方。

香港問題之複雜，在於它與中共對內對外多方面的政策密切相關。為了1997年收回香港，中共創造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最初旨在統一台灣）的概念，給與香港特區自行一套的空間。這一解決方案實際上正是自1920年以來中國的政策特點。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這一問題上，中共允許香港特區在1997年後維持「高度自治」至少50年。換言之，中共希望既保有香港的主權，又獲取維持香港現狀的利益。然而，中共在1997年收回主權的同時，也意味著必須承擔起管治香港的責任。本書的後半部分描述了中共如何在這一責任之下，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資本主義以及香港式的處事方法。然而，中共雖深明對待香港需有別於內地之理，但其出於列寧主義的本質，使黨機關難以不插手香港的公共事務。共產黨式管治與香港式管治的顯著區別，源於其執政經驗之不同。在香港的殖民歷史上，雖然是獨裁式的管治，但它是建基於西方自由傳統的法治之上，而大陸的經驗則來自於傳統的專制統治，以及使中共凌駕一切的列寧主義。

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他們以成功地將香港從殖民統治的枷鎖中解救出來為榮。無論如何，在中共積極籠絡香港的精英，並協助愛國陣營贏得選舉下，「建制派」得以主宰了現在的政治體制，從而打造出新的政治秩序。然而，取得成功就得付出代價。保守的本地勢力要求他們的利益受到保護，自然就延續了早已過時的做法。此外，就算香港社會能理解中共的立場，並同意民主改革落實需時，中共的宣傳機器還是不能完全遏抑市民對普選的訴求。中共私下可能甚至承認，香港的政治機制儘管由各企業集團的利益所主宰，並被公眾視為不公平，但已見舉步維艱。由於這個機制是維護以保守勢力為主導地位而設計的，中共也預期香港社會出現一人一票的訴求。在2004年，中共只能全靠運用權力，通過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對憲法的重新解釋，強調香港實現普選必須循序漸進。然而，到了2007年，中共對2017年開始普選行政長官，以及2020年可能開始的普選立法會表示可以接受。

但許多香港民間組織仍然保持著獨立思考及不妥協的立場。儘管中共持續不斷地宣揚「行政主導」的政府以及「和諧社會」的概念，香港社會繼續對特區政府的權威提出質疑。

2007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落實「一國兩制」的政策是一個「黨在治國理政面臨的重大課題」。為了確保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他指出，黨面臨著一個「新形勢」，即對於最高層機構來說，治理好香港已成為對黨執政能力的考驗。<sup>2</sup>而中共中央統戰部則將新挑戰和新形勢解釋成許多香港本地的問題與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sup>3</sup>此外，中共中央統戰部清楚說出了當局對這情況的看法：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成功實施，促進發展、保持和諧成為港澳社會各界的共識。但是，保持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也遇到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在香港、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大陸主體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沒有先例可循，沒有經驗可資借鑒；香港經濟正處於轉型過程之中，加上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等影響，香港經濟、社會、民生問題相互交錯，利益關係比較複雜。所有這些都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必須解決好的問題，是對我們黨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的考驗。<sup>4</sup>

經濟、社會及民生相關的問題，也就是各利益集團間的衝突的問題。2008年1月，一篇在極有影響力的中央黨校出版物《學習時報》上發表的文章，提出了一種新思想，指出為了迎接挑戰，有必要另建一個由內地幹部和政府官員組成的第二支管治隊伍，負責管理香港事務。該文章由中聯辦研究部主任曹二寶撰寫，而到了2009年4月香港才就此引發討論，但自那時起，它即為論戰提供了足夠的火藥。<sup>5</sup>這篇文章也許會就中共在香港特區公開活動的利弊這一議題，引發實質性的討論（見第十章）。

## 中共故事的六個階段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在大陸成立以來，在香港可以說經歷了六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始於1920年，以三名知識分子創辦的最早馬克思主義出版物為標誌。最初吸引他們的，是馬克思主義似乎提供了如何解決社會問題的具體方法。這個階段經歷1920年代初至1949年中共在內地掌權。這一時期包括一連串的罷工和抵制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江游擊隊的頑抗、國共內戰期間的香港難民潮，以及共黨在香港與廣東之間的密切活動。戰後，中共本可以試圖收回香港，但從黨的利益出發，作出一個戰略決定，讓香港繼續留在英國人手中（見第三、四章）。

第二階段是從1949年中共上台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已開始演變成毛澤東個人的黨。毛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終極政治真理。共產主義思想通過進行大規模政治運動及嚴懲異見人士推行。在廣東進行土地改革期間，香港成為避亂者的庇護所。這一階段包括朝鮮戰爭對香港的影響，以及國共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餘波（見第五章）。

第三階段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0年。香港1967年的暴動就是由香港的中共黨員一手挑起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恩來盡了最大努力保護香港，因為他相信維持殖民地狀況對共產黨有利。他的努力使英國意識到，67暴動沒有得到北京的全力支持。到暴動結束時，由於香港社會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徹底離棄，中共在香港的機構幾乎潰不成軍（見第六章）。

第四階段覆蓋了鄧小平時代的初期。從1981年年底中國決定收回香港時起，對中共來說，首要之務是如何恢復主權並建立自己的後殖民政府。繼中、英政府共同發布《中英聯合聲明》後，中共就開始草擬1997年後的香港憲法—《香港基本法》。身為中共高級領導幹部的許家屯，被派往香港籌備恢復主權工作。他在香港推出了一套針對富豪和經濟精英的新宣傳及統戰方針，以期把此階層從英方搶到中方的陣營（見第七和八章）。

第五階段是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的時期，中共得費九牛二虎之力以挽回誠信。共產黨以為英國可能改動交還香港的決定。在港英政府執政的最後5年中，中共不得不與推行有限民主改革的末任港督打交道，但又懷疑英國借政改讓中共在九七後的管治增煩添亂。儘管中共在港的宣傳機器全力開動，並稱彭定康為「千古罪人」，但不大能動搖港人對港督的認受（見第九章）。

最後階段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個十年。共產黨成立的香港後殖民政府是建立在一個雙管齊下的基礎之上：第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半數議員的選舉團和選舉界別成員，盡屬既得利益階層的商界鉅子和他們的子女；第二，加強親共政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的力量，以及支持愛國團體和積極參政的個人，以使他們能夠操控政治體制。然而，斡旋於不同利益之間並試圖維繫之，是中共自找的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最值得注意的是，民建聯倘與地方勢力，特別是與鄉議局結合，可能會發現自己完全無望成為一個能吸引中產階級的現代化政黨，因為鄉議局的首要願望，是在保護自己在新界的土地權益。這將妨礙民建聯作出有遠見的政策，尤其是中產階級越來越關注的城市發展及環境保護兩個關鍵領域。儘管建制派獨佔優勢，中共在香港的政治機器還是未能扭轉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1997-2005)在其第二任期結束前辭職的命運。即使高官問責制讓他進行強勢領導，但還是無濟於事。問題在於，對他所作出的錯誤決策，開足馬力的中共國家機器也無法力挽狂瀾。曾蔭權作為他的繼任者，繼續浮沉掙扎，但從中共的角度來看，香港已被馴服，一個在中國主權下的新政治秩序正在形成（見第十章）。

下一階段的故事，可能是圍繞中共完全公開，或者至少是公開承認部分其在香港的活動而開展。如果曹二寶在2008年1月的文章確實預示中共正密鑼緊鼓重整其治港策略，那麼這也是時候香港社會商議如何迎接新的政治秩序、檢討目前政治體制固有的問題，以及實行在「一國」範圍內高度自治的權力。本書最後一章，涵蓋了從1997年至2009年的第六階段，亦是第七階段的開始。

## 兩個盤根錯節的難題

### 應付資本主義

在九七後的第一個十年，恰逢一個新世紀的開始，中國共產黨決定不再標榜自己為「革命黨」。<sup>6</sup>相反，他們實際上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sup>7</sup>過去，黨的任務是領導革命。而今天，在黨的領導下，將要進行的是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換言之，詞彙和政策目標皆已改變，然而中共至高無上的地位並沒有改變。無疑，黨高高在上仍然是顛撲不破的核心觀念（見第二章）。

在中共嘗試逐步將人民參政引入政治體制之際，香港選舉制度的設計很可能影響未來內地選舉方式的演變。中共收回香港的經驗很可能使其管理資本主義更得心應手。中共認為，管理好資本家中的精英，就意味著可以管理好資本主義。這就涉及需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繁榮與安定，並且要平衡各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香港的憲法《基本法》的設計，是通過分區和功能界別，將各利益集團納入選舉機制中去。

從80年代初開始，中共領導人就著重思考，如何以社會主義中國的身份來治理好資本主義香港這一難題。鄧小平保證香港九七後「馬照跑、舞照跳」。他還強調，無論持何種個人信仰，只要支持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他都歡迎。就算封建主義，甚至奴隸制也是可以容忍的。換句話說，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社會主義中國甚至做好準備，容忍香港最惡劣的剝削行為，而且該政策將50年不變。事實上，中共對大陸的不平等也表示默許。鄧小平在經濟改革初期的80年代就說過，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20年後，富人的確與黨融為一體。

2001年，江澤民強調必須對「社會新階層」開放黨的大門，標誌著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結束。他倡導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成為把資本家和私人企業家合法地納入共產黨的理論基礎。<sup>8</sup>根據官方的調查顯示，33.9%的民營企業家都是黨員。<sup>9</sup>比例如此

之高的最大可能是，在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中，國有企業的經理和領導幹部往往搖身一變成為重新包裝過的公司老闆及高層管理人員。新階層加入共產黨反映的是中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參與了開創私營企業，而不是在商界冒起之後再來給他們拉上一把。毫無疑問，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是由政府當局繼續主宰。<sup>10</sup>

在內地，城市和農村間的貧富差距之大已使中共領導擔憂。<sup>11</sup>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基礎，黨的領導人可能會認為，將他們一手創造的資本家納入黨內，就可以加強中共的權威與合法性。黨的領導人也可能認為，他們可以通過黨的機制，在必要時約束資本家，以確保不會發生過分剝削的問題。或許他們也相信，只要計畫得周密，共產黨沒有什麼不能管好，何況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現在，畢竟已有286萬或百分之四的共產黨員在私營企業工作。<sup>12</sup>在過去20年裡，中共統戰工作在香港取得成功，可能令他們更相信，管理好資本家就可以管理好資本主義。事實上，就像許家屯指出的，資本家的政治傾向通常隨著自己的商業利益而改變，因此採取適當的獎勵或懲罰措施，就可以控制他們。

香港現時已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之一。<sup>13</sup>北京既致力保持繁榮，很可能擴大了貧富之間的差距。1995年，港英政府擬增加社會福利開支，一名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是這樣形容的：「照這個速度往前開，不用多少年，肯定會車毀人亡，而車上坐的正是六百多萬香港市民。」<sup>14</sup>董建華順水推舟埋怨港英當局增加社會福利開支，試圖淡化自己1998年度的財政擴張政策。<sup>15</sup>

另一個令香港人常常抱怨的現象是「官商勾結」，反映人們對既得利益滲入到政治制度中時，公眾利益如何能得到保障的疑慮。在80年代，中共主要選擇富商參與草擬基本法，並讓他們進入回歸後的政府，使他們的利益在政治上獲得優先保障。今天的中共，像當年的英國一樣面臨相同困境。香港市民既無權選擇本地領導人，除了商界精英外，還有誰會支持並維護這樣的政治制度？中共實質上保留殖民地制度，因為那是一個久經考驗、可維持中央控制的一種制度。



香港特區政府制定政策時日趨重視利益的均衡。因此，曾蔭權2007年角逐連任時，曾表明會鼓勵政府官員改變思維，由政策制定者變成利益協調者，從而平衡各方利益。<sup>16</sup>制定政策時，平衡「利益」將高於一切。曾蔭權也許是受了胡錦濤在第17屆全國人大會議上的講話，以及中共中央統戰部對胡主席講話的解釋的影響：胡錦濤在講話中指出，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與安定出現了「新形勢」。如前所述，在這一章中，黨眼中的「新形勢」，就是指香港本地的問題和各方利益衝突。至於中共中央統戰部的解釋，可能對曾蔭權注重利益的協調有所啟發。由此出發，一般市民只是多種利益的相關者之一，而且公眾利益並不一定被視為主要利益，還有許多其他的利益有待考慮。此外，更重要的是曾蔭權將平衡各方利益置於政府政策制定這個職能之上。換句話說，他領導的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是以利益為依歸，而這些利益又深植於香港的政治體系之中。因此，無論新政策的倡議是否能得到多數政治利益相關者的支持，都會成為政府制定政策的首要考慮。<sup>17</sup>制定政策時務求「平衡利益」，成敗就取決於由此訂定的政策是否能解決問題，是否會局限解決方案，從而使事情難有進展。

## 選舉管理

1997年後，香港特區的政治機制既納入選舉，而《基本法》又寫明「最終目的」會實現普選，那麼中共就不能不在選舉上做點工夫。在選舉上做點工夫，就是要決定誰能當選。迄今，其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親政府聯盟，以實施香港特區的「行政主導」制度，從而維護香港的安全和資本家的利益。也就是說，中共插手選舉的藍圖，是要確保關鍵的政府政策在立法機關能得到通過，確保「反華」分子無法左右這個制度，以及確保安插在這機制中且佔主導地位的商業利益有力使反映資本主義的政策得到足夠支持。